

政 戰 名 將 錄

(續完)

裘 軫

陳辭修築路打勝仗

國軍對當時之種種困難，自應想辦法對付，首先得將戰略大加修正，步步為營，穩紮穩打，參酌戚繼光紀效叢書，禦倭的辦法，採用興建碉堡，間隔五百公尺，聲氣可通並可互為火力交叉之支援。到處有公路可通，不但軍用補給可以快速到達，更於戰況緊急時，調動部隊增援，迅速確實，此種構想本出於政工人員之建議。但在北路總指揮陳辭修(誠)召開之作戰檢討會上，提出之時，到會各軍師長多不表贊成，指為事實上不能辦到，恐無補實際。幸陳氏感應靈敏，智慧卓越，認為四次圍剿，費時五六年，仍未奏膚功，以共匪的狡詐，我們祇有採取笨辦法，不求急功，部隊以築路為首要任務，公路所到之村鎮，均有碉堡為據點，不虞匪軍反撲，收效雖緩慢；但贛南匪區不過十來縣，逐漸縮小包圍圈，有一年半載，也可澈底消滅匪蹤。於是政工人員提出「築路就是打勝仗」的口號，終在此項建議下大行其是。及至廣昌寧都一告克復，瑞金匪窟立被震撼，朱毛才有奪路西竄之部署。當時卅萬大軍合圍，北路原為主力，東路趙觀濤，南路余漢謀，均有戮力

聚殲之決心。唯獨西路何鍵，觀念陳舊，有自保實力之私心。朱毛率部眾十餘萬人(包括被裹脅的五六萬人在內)，西向湘境，若何鍵能合力堵擊，朱毛不難被消滅；那知何鍵所部竟讓共匪入湘後竄往桂黔，使中央軍追趕不及，由黔而川，一直到川北松潘一帶，胡宗南師與匪苦戰兼旬，本可確取最後戰果，亦以東北軍徙駐西北，情緒惡劣，無心力戰，王以哲何柱國分防天水平涼之線，竟接受匪謀之遊說，成了一種默契；祇須匪軍不攻平涼天水兩城，在城外鄉野竄越而過，他們就不出城追擊，因此匪軍全力擺脫胡宗南之纏鬥，得以到達陝北延安，張學良之東北軍就在這時開始被滲透，而有民國廿五年雙十二西安事變，亦即種因於此，以至民國卅八年大陸淪入匪手。

當朱毛在贛南開始西竄之初，政工人員立即撫輯流亡，飛機散發傳單和良民證，祇須肯回故鄉，自己選擇田地先耕，這田地就永遠是你們的了，死為他鄉之鬼，是比下地獄更為悽慘！四川雖是天府之國，絕不是你們的天堂！有良民證便可回鄉，任你圈地耕作，不收租，不納稅，故鄉才是天堂呀！這一政工措施，收效很大，被匪裹脅的，伺機開溜，意志不堅的也消極潛逃，至

少有五六萬人散回贛南各縣。國軍對他們不究既往，編組保甲，四鄉無主田地，均可圈擇耕作，因為許多地主被匪殺害，即有倖存者亦多逃往南昌等城市謀生，共匪倡行分田地，一無保障，如今在國軍撫慰下，真正分得田地了！凡經編組保甲之民衆，免費供應糧米，食鹽，匪區民衆已有五六年淡食，弄得人人疲乏無力，這給當地民衆的實惠，確使歷經戰亂的人民感動得掉下眼淚，政工人員對國家的貢獻，功不可沒！

劉健羣與康澤鄧悌

民國廿四年春間，贛南肅清共匪後，剿匪軍事重心，指向豫鄂邊區的匪軍徐向前賀龍。賀衷寒即成立武漢行營政訓處，移駐武昌使署口，副處長是袁守謙，祕書長是趙定昌。四川方面雖設立成都行轅；但未設立強大的政工單位，這原因是川籍黃埔三期同學康澤率領原在江西成立之別動隊回川，在各縣從事組織，辦理保防工作，和國家主義派早在川軍所打下的基礎，到處摩擦，李璜在其著述曾詳言其事。康對湖南籍之黃埔同學領導人物如賀衷寒，劉詠堯，蕭贊育等並不尊

重合作，康又不喜軍隊政工之名稱，他是醉心帶

兵之大將威風，雖然他不適宜統軍作戰，而無自



民國二十一年冬五次圍剿時期，陳辭修將軍（中立持指揮刀者）率部追擊匪軍途中，攝於江西永豐血園亭。

知之明，他到民國卅七年才有機會接替川軍潘文華在宜昌之第六綏靖區主任，但襄樊一戰，全軍盡墨，被匪生擒，至堪浩歎，賀衷寒已在青雲得志，他說民主政治取決於多數；但多數的表決，並不一定代表真理，一位識見遠大，才學出眾的高人，自然比庸碌的多數更有貢獻。可是民主政治的運用，高人的主張抵不過庸碌的多數。賀氏沉醉於這套理論，曾於民國廿五年出國往德國考察，他的職務由袁守謙代行，賀氏返國後，適逢西安事變張楊劫持領袖，中央決議明令討伐，何應欽且已被任命為討逆總司令，前敵總指揮樊崧甫且已出動向潼關進攻。但由於端納顧問事先安排，由蔣夫人暨宋子文飛往西安而獲化干戈為玉帛的成果。當時賀氏對討逆發表言論最多，不啻為政府之發言人。

中央軍校的政訓處，在鄧梯主持下數年，成績很不

錯，八期招生嚴格限定高中畢業，素質上從此提高。對於各部隊非軍校出身之軍官實施再教育，先後辦憲警班，高等教育班，分期召訓，主要的使他們服膺黨的三民主義，消除地域觀念，服從最高領袖，獻身黨國，致力安內攘外的中央決策，更可貴的軍校有數千學員生，共匪從未滲透得逞，數年來均未鬧過思想問題；但由於軍校教育長張治中與鄧梯之間，漸生隔膜，又加上各自手下人的挑撥，不免已有若干成見，有一位政治教官張韶舞，與張治中為同鄉，在一次集會上，在衆多學員面前公開發表演說，大肆抨擊鄧梯，鄧當時未到場，他指責鄧是新官僚，任用私人，不配領導同學之革命精神，張治中身為主席，不加糾正。事後鄧獲悉此事，當面詰責教育長，如此公然侮辱長官，若無背景大力支持，他怎敢如此放肆。結果張韶舞被撤職，鄧表面雖佔上風；但精神上頗感痛苦。不安於位，自請辭職，要求出國到歐洲各國考察，此為民國廿三年春間之事，鄧出國遺缺由劉健羣接任，劉本來在華北主持宣傳總隊，在北平週旋於各方，聲勢極為喧赫。可是日本方面侵略正亟，屢施壓力不許華北各部隊有政工建制，因而改以宣傳總隊名義沖淡日方侵略之藉口，劉接任軍校政訓處長不久，陞遷總政訓處長，主持全國軍隊政工事宜。其後又由考察返國之賀衷寒復職，重作馮婦。劉離軍校時，軍校政訓處長由邱清泉接任，邱不久出任新五軍機械化部隊新廿二師師長。到民國廿六年七七抗日事件，政府號召各黨派共赴國難，在統帥部特設第六部，延攬各方人士（包括共產黨在內）參加

動員民衆之組訓宣傳工作，到廿七年武漢撤守以後，第六部改組爲政治部，以陳辭修爲部長，祕書長爲賀衷寒，副部長爲周恩來，黃琪翔（代表第三黨。）周末到職。一二廳長均係黃埔同學，如袁守謙，徐會之，劉詠堯均曾當過廳長，第三廳爲郭沫若，郭找了田漢，洪深陽翰笙等，專攬抗日宣傳，確有相當表現，但廿八年江北新四軍葉挺部隊不遵統帥部調遣，擅自襲擊國軍，而被激械收編，與中共破險，郭等離去，而由黃少谷接任。第四廳主辦經理業務，廳長爲吳子漪。賀衷寒仍然大權獨攬，各部隊政工主官之委派，常不經部長核可逕行發表，使陳部長感到不滿。後來周之懸缺由王東原接替。陳賀之間既有芥蒂摩擦，不久表面化，祕書長職位被撤銷，賀氏調任復興關中央訓練團教育長，他負氣不就，在重慶李子壩閒居年餘，最高當局不再考慮他之出處。後來有一位熱心人士不經賀氏之商談，私下向當時軍委會銓敘廳長林蔚呼籲，請求林氏以銓敘廳長身份向最高當局建言：賀氏爲不可多得之人才，又屬黃埔同學有領導力之人物，長此任其閒散，未免可惜，最高當局雖表接納；但要挫挫他的傲氣，祇給他一個新設單位勞動局長，是隸屬社會部谷正綱部長之下，最初編制僅有十九人。谷原是第三戰區政治部主任，在賀心目中是舊部，如今翻過來，做媳婦的人當起婆婆來了，照說賀氏說什麼都不肯屈就。但經友好告知最高當局之心意，這次如果不就，那末永遠不會任用他了！他不得不到差，十九名員司都由他自己安排，他延用了一位美國普林斯頓大學

出身的孫伯齊爲處長，這位孫氏在民國廿七年武漢成立戰幹團，教育長桂永清曾請他當過政治部主任，武漢撤守，桂又轉任第四十五軍軍長，孫一直是成都賦閒。賀氏是有作爲，喜歡有表現的人，勞動局又是新設機構，想展開業務。但以抗戰期間，軍事第一，對社會部主管之勞動局，實無財力可供擴張，谷亦無力支持他。因此有人譏嘲賀氏，贈他對聯：「勞而無功，動輒得咎！」

陳辭修在部長任內是設軍政治部，（師不設政治部）直接指揮團，營，連，指導員，加強抗日宣傳，軍政治部配置政工隊，男女青年任隊員，話劇，歌詠，壁報，大放異彩。各戰區政治部主任選拔人員，如第一戰區袁守謙，第三戰區爲谷正綱（後爲李壽雍），第六戰區爲顏肖鵬，（後爲柳克述）桂林行營政治部兼第七戰區爲梁寒操，皆著聲譽，爲社會所尊重之人士，其他戰區則多爲與部隊長官有歷史之人担任，如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爲李宗仁，政治部主任爲程思遠卽是一例。

民國廿九年因宜昌戰役之後，陳誠出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，部長由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張治中接任。張和陳作風及個性完全不同，張延攬滕傑爲第二廳長，又以黃少谷接替郭沫若爲第三廳長。黃琪翔亦隨陳誠去六戰區任副長官，副部長遺缺由袁守謙接任。張是很想抓兵權之人，過去任軍校教育長曾兼過教導第二師長，後擴編第五軍，他仍兼軍長，但均無戰功，交卸第五軍長以後，在抗日期間迄無機會重領師干。他當了政治部長，仍念念不忘兵權之可貴，於是提出主張：

撤銷軍政治部，仍設師政治部，以主任兼副師長名義，團指兼副團長名義。實際上原有副師長以外，增設一副師長而已，政治部主任雖名爲副師長並不能過問師部各項業務之執行，充其量僅僅是在工作報告上改換一些內容，並不因改制而擴展政工效能。張部長自到任以迄交卸，從未離開過陪都重慶，他的做官訣竅，專侍候上峯臉色，善事迎逢。他的人緣也不够好，各戰區長官大都對他沒有好印象，所以他不到各戰區和戰區長官接觸。總司令以下，他又自以爲不屑和他們結納。在他任內蘇北發出解除共黨部隊新四軍葉挺被扣押事件，因延安方面頗多抗議，惡意攻訐，中樞推派張治中發言應付，他說：重慶有新華日報，延安沒有中央所屬報紙，共黨人士在重慶來去自由。國民黨方面，任何人進不去延安，這是不是公平？新四軍公然抗命，不打日寇僞軍，專打國軍，國法所不容，這不是對共黨部隊有何歧視，而是維護抗日陣容之完整。另一件大事張建議統帥部凡軍師長之調動升遷，應報經統帥部最高人事會報核議決定，他的企圖無形剝奪戰區長官對軍師長任用考核之權，各戰區報到統帥部，人事會報開議之前，照例由政治部會同軍政部先行審查簽註意見，他以為這樣一來，可以抬高自己在軍中的威望。他不像陳辭修之苦幹實幹，進取事功。陳見到抗戰已三四年，何日可以勝利本是無法解答的問題，人心浮動，難免影響大局，他會動腦筋去加強軍民信心，他對部屬訓話：有人問我抗戰到底，這個「底」究竟是在那裏？我們不必指責問，這個話的人是動搖軍心，官腔並不能消除他

們胸中塊壘，我們應有說服他們堅定信心的做法：螞蟻蜈蚣打仗，任誰都以為打不過蜈蚣，螞蟻必敗無疑！可是螞蟻有它的智慧，守住洞穴，蜈蚣無法進去，祇能在洞口打轉，愈轉愈性急，轉一次向洞口窺探，螞蟻便咬它一口，這樣相持終日，蜈蚣精疲力竭，最後是僵直不能動彈，螞蟻便成羣出來叮嚙，大奏凱歌，若有人問起，抗戰到底的「底」就等着蜈蚣僵直便是「底」，他強調政工人員說話應有技巧，避免教條八股的說法，若直說打倒日寇軍閥就是「底」，人們一定會感到迷惑。陳氏亦曾就球類運動作譬，外國人是沒辦法去想出辦法，我們則是有辦法而不運用辦法，就以籃球足球來說，外國高樓大廈，像住在火柴盒那狹小的空間，或是整天在機器房給噪音

麻木了頭腦，所以做球類運動，弛鬆一下，是在沒辦法中想辦法；我們在戰地在鄉野，漫山遍野，任我們自由奔馳，什麼競技賽跑都可做，你們不肯用腦筋懶得想，懶得做，想東施效顰提倡球類運動，作為健身之用，顯然是不合時宜，你們何嘗看到美國西部牛仔熱中打球的電影。從這些小事，足證陳氏雖做大官，還是用腦筋在設想探究真理。他當部長，廿八年冬季桂南崑崙關戰役，他親自到前線，五塘六塘七塘都有他足跡，廿九年春夏，宜昌緊急，他在火線掩蔽部督師，宜昌雖未能固守；但南津關終於把來勢汹汹的強敵扼住，也是虧他親自在三遊洞的石橋上，親自把守，一面收容廿九集團軍張自忠部隊潰散下來的官兵，日寇終於不能打開我們四川的大門，還是仰仗陳部長親自表現最佳

政工示範之一例。張治中當部長，在卅三年冬季，敵軍進迫貴陽，重慶被震撼，已準備再度遷都西昌之緊急關頭，最高當局鑒於局勢惡劣，曾將作戰不力之軍長陳牧農就地正法，何總長親自臨陣督師，連社會部部长谷正綱也請纓到前方去做軍民合力抗敵的工作，這樣才把戰局穩定下來，敵軍知難而退，張治中則未離都門一步，兩人作風之不同，可供世人參考。

蔣經國氏重整旗鼓

民國卅四年抗日勝利後，我國受美國壓力，應促成國共合作，主張組成聯合政府，因而接納美方建議，將政治部自行撤銷，改採美國方式，成為國防部新聞局，以鄧文儀為局長，張治中則出任西北長官，為陝甘新青諸省之軍政首長。但於馬歇爾來華協調和談中，張奉命為政府出面之代表接觸人，他心地不純，小丑性的勢利狗眼，以為馬歇爾是打勝希特勒，東條之最高權威，大事逢迎遷就，企圖左右逢源，造成他在未來聯合政府最突出地位，對於國軍政工改制為美國式之新聞業務最表熱中，換取馬歇爾對他之好感，殊不知國軍解除精神武裝，國軍以後一連串的失敗，都造因於此！乃至他巴結周恩來，招待周恩來住在自己會家岩的官舍，又復演變到李代總統之和談代表，終向毛共投靠依附，無非是他權力慾之逞私，犧牲國家利益，不稍瞻顧之人。

新聞局業務難以做好，本在意料之中，尤以鄧文儀，忠勤有餘，但在複雜演變之局勢中，他又能做什麼。到了和談破裂，新聞局仍改組為政工局，亦無補於實際。

政府播遷台北之後，成立總政治部，以蔣經國為主任，才有重振旗鼓之氣象，以後均以資深之高級將領為政戰部主任，足證當局對此之重視，不啻視為軍中之靈魂，精神的再武裝。相信他們必能以開創革命精神來創造時勢，反攻復國，展開一個新的紀元。



民國四十一年，國防部總政治部蔣經國主任與時任行政院長之陳誠將軍。